

二〇〇四年兩性角色工作坊

婦女與政治參與

李詠怡編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

主辦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二〇〇四年兩性角色工作坊

婦女與政治參與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

主辦

籌備委員會

張妙清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主任
李詠怡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黃慧貞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副教授
Eleanor Holroyd	香港中文大學那打素護理學院副教授
張燕琪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性別研究中心主任: 張妙清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心理系
性別研究中心副主任: 葉漢明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性別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麥建英小姐	

歡迎各界人士與本中心聯絡, 來函請寄:

香港新界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利黃瑤碧樓五樓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
電話: (852) 2609 8775
傳真: (852) 2603 5215
電郵: grcentre@cuhk.edu.hk

二〇〇四年兩性角色工作坊

婦女與政治參與

李詠怡編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

主辦

婦女與政治參與

主 編	李詠怡
執行編輯	麥建英、張燕琪
封面設計	譚光暉
出 版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	

目 錄

歡迎辭

張妙清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主任)……1

嘉賓發言

陸恭蕙(思匯政策研究所行政總監) …………… 4

論壇

黃碧雲博士(香港理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 9

陳樹英議員(民主黨屯門區議員)…………… 18

金佩璋議員(公民起動灣仔區議員)…………… 23

黃碧兒女士,JP(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婦女事務))…… 29

台下聽眾提問…………… 33

嘉賓回應…………… 37

分組討論報告…………… 42

第一組：香港婦女參與政治遇到甚麼障礙？如何消除這些障礙

(例如政府的角色、社會和教育等)？

第二組：怎樣培養婦女的政治領導能力？

第三、四組：婦女參與政治能如何加強政策及立法的性別觀點？

現有的政治架構是否缺乏性別觸覺？

總結討論

婦女與政治參與

歡迎辭

張妙清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自一九九一年起，每年均舉辦「兩性角色工作坊」，至今已有十四年歷史。舉辦工作坊的目的，是讓學者、決策者、婦女及前線工作者共聚一堂，從不同角度去探討與性別有關的課題，讓學術、政策和服務能互相配合，謀求婦女福祉。

今年我們的工作坊主題為《婦女與政治參與》。政治參與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但二十一世紀的香港女性，是否已享有和男性平等的參政機會？

香港自九十年代開始加強政治發展，但從從政的男女比例來看，婦女參政的比例仍然偏低。1994年當選區議員的女性有36名，佔11.4%；1999年為57名，佔14.6%；2003年微升至71名，佔17.8%。1995年立法局的女議員比例是11.7%（7名）；1998年和2000年立法會的女議員同樣為16.7%（10名）。

女性參加選舉的人數亦逐漸增加；1999年的區議會選舉，女性候選人有129名，佔16.2%；2003年增至147名，佔21.3%。1998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女性候選人有25名，佔15.1%；2000年則有28名，佔18.1%。雖然女性參政的人數已有所增加，但以十年來看，其增幅卻十分緩慢。目前，男女議員比例中，女性比例少於五分之一。

當然，參政是個人的選擇，但社會及家庭對婦女參政的態度是否構成障礙？政府及政黨對婦女參政有沒有積極提供機會，去培養女性政治領袖？

中文大學性別研究中心於1992-93受沙田區議會委託，調查沙田婦女參與區內事務的情況，其中一項結果顯示，男性被訪者一般不歡迎女性參政，甚至有個別被訪者反對妻子參與社區事務，認為此舉會破壞家庭關係；而女性被訪者亦多數認為先要照顧妥當家庭才可以參與家庭以外的社區活動。事隔十多年，這些社會態度是否仍然普遍存在？我們又如何能夠改善婦女參政的條件？

本工作坊希望探討現時女性參與政治的狀況，以及面對的機會和障礙。討論的範圍包括女性在各公共領域的參與狀況、女性政治領袖的培訓和女性參政可帶來的政策議題，及政黨在提供女性參政機會方面的角色和局限。是次工作坊我們邀請了思匯政策研究所行政總監陸恭蕙小姐，就性別角度分析香港政治參與問題。此外，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婦女事務)黃碧兒女士會講述政府在培訓女性公共領袖方面的政策方向；屯門區議員陳樹英女士會分析政黨政治對女性參政的影響；香港理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黃碧雲博士會從女性主義角度討論女性與政治問題；灣仔區議員金佩瑋則和大家分享如何把女性觀點融入公共政策議題。

嘉賓發言

陸恭蕙女士

思匯政策研究所行政總監



我猜在座各位本身已是積極參與社會事務，那麼今天我可以和大家分享甚麼呢？或者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對婦女參與政治事務的一些經驗。很多人都曾經問過我，「妳從海外留學回港後，如何能夠重新投入香港社會呢？」我1979年回來香港，當時約二十多歲，香港還是一個殖民地社會。那時，我認識了張妙清博士和一班朋友，他們的年齡有些比我大少許，當中有部份是學者，有部份是專業人士。當時，我從未見過香港有這樣子的一群人，他們每個月都有聚會，會討論一些香港的時事問題。那時候我還幼稚得連甚麼是時事問題也不知道，只知有些事情能引發我的興趣，例如：巴士為何要加價、老婆婆到公立醫院為何要輪候四小時才可以看醫生等。就正因當時刺激我提出很多問題，問為甚麼我們的社會有這些現象，於是我由1979年便開始參加一些很難型的論政團體，在那裡它們刺激我去思考、反省和學習關於我的社會——香港是甚麼。

到八十年代初期，我猜大家還會記得，香港市民都在想回歸這問題。中英政府進行談判時，我才二十多歲，真的沒曾想過這麼多，但我想身邊和社會裡都發生著許多事情，那是需要我們去思考的。踏入八十年代中期，很多朋友、家人都考慮是否要移民。移民是一件大事情，因為我們要在自己的社會裡拔起自己，再放在新的地方。更要思考往哪裡去、為甚麼要到哪裡去。那段時間我同樣有很多思想，包括如何看待香港、如何看待中國。我們將要回歸中國，但我們對中國又有多少認識呢？原來是非常膚淺，甚至一丁點兒也沒有。至九十年代，可能因為我之前有觀察社會的經驗，所以被港英政府委任了入立法會。委任是挺特別的事情，因為那不是自己爭取的。它有別於選舉，選舉需要付出很多心機和氣力，才有望勝出一個席位，但委任就只是有人打電話來，問妳願不願意當議員。雖然有段時間是對社會上的各種問題有點認識和興趣，但當真的踏進立法會裏要舉手投票時，才發覺有許多事情要考慮。由1992年開始，對我來說是個人成長的一個里程碑。我之前從沒有想過搞政治是怎麼一回事。雖然曾參與論政團體或非政府機構(NGO)，是地球之友的活躍會員，更做過兩屆主席，但跳出社會團體去參與社會事務，和真正要參與政治舞台運作

是兩回事。

話說回頭，香港始終是個中國人社會，曾有人問我搞政治是否很骯髒的一回事，我覺得中國人的文化裡，「政治」二字是被理解為跟當權者角力。要爭取的說法和行動都像是跟當權者對立；在街頭收集簽名遞交給行政會議和特首這類活動，也有人認為不要舉辦那麼多，因為這麼接近當權者，或許會存在一定風險。另外，傳統中國人思想也不想女人搞政治。有人說，我們要搞溫和政治，但溫和政治跟強硬政治的區別是甚麼？我以自己作為一個例子，可能是因為自己年輕時已有機會參與論政和參加不同團體，並進入了立法會，所以我覺得自己可以很軟弱，也可以很強硬。強硬的那些已試過，並且沒有發生甚麼問題，97年前後均無沒有事。過程中如何硬起來，背後其實是有一定的理論、方法和知識，可軟可硬。但我發覺很多人看到硬的時候就覺得很不舒服。

在此分享一件事情，我的妹妹較我年輕18年，今年才30歲。本來不是搞社會運動的人。她熱愛運動，是一名游泳健將，曾在兩屆奧林匹克運動會中代表香港去韓國出賽。今年香港隊出了些事故：幾位運動員中部份是國內人士，他們在香港居住了一段時間；有些是外籍人士，他們在香港出世，願意代表香港多於代表英國參賽，是很優秀的運動員。其中一個只有十五歲，他是今年全世界游100米同齡組別中最優秀的一個。他是一位外籍人士，在香港出生並在香港長大，他說寧願代表香港隊而不代表英國出賽，但可以嗎？在制度上是可行的。因為香港是個很特殊的地方，那些是香港永久居民，和那些是香港居民可以代表香港參賽，政府早已跟國內商討定案：包括國內人士和外籍人士在香港出世的，均可以代表香港。可是，不知怎樣，香港奧運代表委員跟奧委會開會時忘了將這情況提出，故此奧委會刪除了這批人。妹妹和以前的游泳朋友覺得此事不妥當，認為必須給予他們一個身份以代表香港，所以她們做了很多事情，包括自行發起簽名運動和要求見這個、見那個。現在此事已得到解決。當時她也曾問我意見：要怎辦才適合或效果會較好？要找甚麼人？例如立法會中那些議

員跟運動員組別有關係？如何進行研究？如何申明道理？我提供了些很硬的方法給她，說我們可以要求他們交待和承擔。她想過後曾打電話給我說感到很害怕，她做不到。那時我學會了一樣事情，明白了，知道了她已負擔了很多，並很熱心，很想繼續，卻因為沒有以政治手法去達到目的的經驗，故此感到很害怕。

我想和你們分享的就是搞政治。即使沒有議會議員的身份，可以採用的手法還有很多，硬軟方法要兩手準備。我們不用擔心硬的方法不為社會接受，或者當權者會很抗拒。事實上今日香港的當權者都習慣很多很硬的手法，問題是我們要追求甚麼。如果有些事情我們覺得真的值得放時間去處理，或者有些事情例如性別問題是被人疏忽的，首先是要先做功課，在使出硬的方法時，你需要繼續站穩腳步，人家才會繼續支持你。如果你背後的論點不穩固，只在喊口號，自己也不知為了些甚麼，結果那事情會變得不夠力度，難以繼續。但對的事情，就不用怕去做。大家可以學習有頗多方法可跟市民溝通，介紹問題讓大眾可以接受。

我覺得婦女參與政治不限於選舉政治，也泛指一切對社會的關心。我不當自己是個婦權份子，因為在成長過程中我從未想過。我92年進入立法會後才學會社會有很多不同的範疇，即使自己作為女性應該關心的東西，原來都未曾學過。我猜想在香港的學校裏，一個18歲的年青人，在讀書過程中能接觸到有關的思想可能不多；18歲之後，在社會或大學裡，能刺激到他對這方面的思考也可能不多；再想像一個廿多歲的年青人在社會中，有那些關乎婦女議題的事情，和社會進步有關的事情可接觸和引發思考呢？我相信上一代媽媽輩已為我們爭取了許多，例如教育、一個為社會所接受的職業女性形象，那麼到我們現在這一代又要如何呢？我們要為下一代婦女爭取甚麼呢？我們要越來越多人覺得搞政治（不單選舉政治）和社會運動是理所當然的，包括用軟或硬的方法。

最後，參政 OK 嗎？出來參政是怎樣的一回事呢？以我自己為

例，首先是透過委任而進入議會的。至於要爭取和搞選舉是否無可能呢？我看也不是。我覺得今年2004年選舉很值得反省。很多人可能會問，現在的形勢很不好，很多噪音，廚房很熱，我們是否要在這時候踏進去。但就正是在很熱的時候，才令人想起自己可以為社會做甚麼，或者可以支持甚麼人做些甚麼。現在香港人已接受了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我們要學做公民。我們香港有自己的特色——香港是一個自由社會，擁有言論自由；有不錯的教育水平；說話直接，是較現代的中國人文化。在這大中國的形勢下，香港要如何發展，如何立足呢？現在社會裡有很多爭論，是真正踏入了回歸的過程。97年以前只是在說著，那時是籌備階段，現在則要實行出來。現階段很有挑戰性，在於我們可以扮演怎麼樣的角色。政治在香港已普遍化，大眾看報紙、聽收音機、跟朋友討論，要出來做些事，是很好的現象，於歷史上可能是香港的新元素。我至少可以說自己很珍惜這段時間，珍惜80年代由港英時代起，到了現在要創出一個新的香港，由港人治港，我也覺得自己是創港的一份子。

四周很多人都思想這些問題，卻可能未想過採取行動，所以這次在立法會選舉中多新人參選是個很好的訊息，代表香港人都比較活躍，同時也代表了現在的政治舞台是可以競爭的，能夠存在不同黨派、不同理念。政治就是這樣，爭可以說是黑暗，因為不和；但另一角度，為何要爭，是因為對將來有不同理念。一套和平爭取的機制，能向市民說明各種理念和如何實行。我們現正來到此處，真的要做事行動。我希望各界婦女，可以在此里程碑中發揮力量。

我知道中文大學這裡是個重要的中心，因為這裡的研究使婦女的思想在上述問題上加闊、加深和壯大。多謝各位。

論壇

黃碧雲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這份是初稿，我將跟大家分享我的研究和看法。我會集中講述女性選民的五個範疇，第一部份會很快結束。大會給我的題目是婦女與政治參與，我不清楚大會要求我說的是建制裡的參與還是建制外的參與；是說選民還是真正投入參與。這個題目可以說許多天。或者我先說選民，這部份會快點結束，因為相信大家的興趣是真正去參選，所以我們或者會多說那部份。香港研究政治與婦女課題的人很少，因為研究政治的人沒有興趣研究婦女；研究婦女的人又只管婦女的事務，所以使這環節真空。可是在外國，研究婦女與政治（Women and politics）已經在政治學和比較政治學裡成為一個專門領域。我也覺得自己有責任做一下這方面的研究，或者希望能夠引發更多人參與研究。我今天會運用一些資料（data source）看看最近一次區議會選舉（立法會選舉因還未到，所以遲些可能做立法會研究），看看女人搞不搞政治；除了投票外，有沒有人去參選，又有那些人去參選。

女人應不應該出來參選，如果她們要去選，又有那些理據支持。我會提出眾多不同的看法，有些我們會同意，有些則有保留，希望引發大家討論。然後會看看有甚麼方法可以鼓勵更多女人出來參選。剛才張妙清博士提到在建制裡那個比例是不成比例的，都是男人多於女人，香港如此，全世界亦如此，除了北歐四國就特別多女人，在她們的國會中佔四成是女人，政府中有許多也是女人，但其他地方和區域都很少女人。其實這個問題在世界各地已有許多人研究過，究竟是甚麼因素令女人不出來參選呢？剛才張妙清博士已提到一些家庭因素、丈夫等，許多都跟性別角色有關。我們會看看有甚麼方法和措施鼓勵她們，而其他國家和區域又有甚麼經驗，最後回來看看香港的一些性別和政治問題，一些我們要去面對和值得思考的問題。

第一部份是選民，就是去投票的一環。這部份需要大家留意是因為當我們說政治參與時，我們第一個印象就只有男人才關心政治，女人不關心。但在投票和登記選民這一領域中，基本上已否定了這一說法。看看香港的選民登記，2000年的數據告訴我們，登記的選民有差不多48%。最近辦了一次選民登記，暫時我們未知選民的增長數目如何，當中多少是男性，多少是女性。這裡要勞煩黃碧兒替我們追

查一下選舉事務處，公佈些數字才可作研究。但暫看這裡的數字，大約一半是女性登記的，如果說是少過男人都是少很少很少的。再看登記之後會否去投票，2000年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頗高，數字可幫助我們作出分析：2000年立法會選舉男女投票率均是43.6%，是打和的。故不能說女人不關心政治，其實是彼此打和。再看99和98年，99年是區議會選舉，98年是立法會選舉，兩個選舉女性的投票率都高於男性。數據幫助了解女性對政治的關注。而在91和94年的區議會選舉中，亦出現同樣的現象，整體上女性的投票率是高於男性。但若加上年齡這因素作考量，我們會有新的發現。我們會看到有一個年齡組別的女性是不大喜歡去投票，又或是她們的投票率低一點，她們就是那些大概是五十歲以上年長一點的女性。除了年長一點行動不便、未曾讀書所以不識字和不會看報紙的女性投票率較低外，其他年齡組別，如年青、成年和中年的女性的投票行為其實跟男性是沒有分別，有時候甚至會更加積極。所以如果在選舉最後衝刺要拉票時，一個年輕或者中年女性的投票比率機會可能較一個男性路人甲還要高，因此我們可能要重新整理這些固有印象。因為時間有限，這部份到此為止吧！

我們要問一個問題，其實女人也登記做選民，而且除了年紀較大的一群外，投票更可能較男性熱心，但為何男女議員比例有一段差距呢？例如81至97年區議會女性議員的比例跟男性相差很遠；81-82年有250個男議員，女性只有廿多卅個左右，而這個差距在過去十多年都沒有很大變化，直至94年這差距仍然很大。為甚麼會相差這麼遠呢？這涉及到為甚麼很少女性出來參選，而且數目比男性少這麼多；同時，當我們反過來要了解和解決這問題時，我們要問問到底有那些女性出來參選？為甚麼她們會參選？這些是2003年區議會選舉的數據，在選舉事務處的網頁可以找到。當然事務處不會作任何分析，但慶幸還能顯示一個性別的因素在內。我就這些數據作了兩個分析，但因為資料所限，我只做了政黨分析和職業背景的分析。從數據可見，有837人出來參選，其中女性有148人，佔17.7%。從政黨背景中可見這些人是否來自政黨或是跟政黨無關。當中35（34+1）

人是來自民建聯(34以外的另一人填報是「民建聯 / 工聯會」); 22人是來自民主黨(有一說法是23人, 民協7人, 自由黨4人, 公民起動4 (3+1) 人(其中一人填報「公民起動 / 前線」)), 這裡有幾個公民起動的成員曾有參與婦運的經驗, 因此這組織頗特別。金金(金佩璋)因為是公民起動的身份, 等會兒可以多說點; 前線2人; 公民力量, 我猜是劉江華那一派; 另有一個是元朗天水圍民主陣線, 我不大清楚這個組織, 不知道是否真的民主; 七一人民批是一群較年輕, 七一後出來的人士組成的, 當中有一位女性; 獨立人士有15人; 不詳者有50人。

單看這些數字, 首先, 若加上前線, 基本上有一半人有政黨背景或跟政黨有聯繫, 其他一半則不知道。不知道的當中也有點玄機, 因為有可能是沒有呈報上去: 她或者屬於某個政黨, 但又不想讓人知道, 這一類我們沒法子研究。有一半參選人是具政黨背景的, 我們可見政黨是有招募和推動參選的作用。最強勁者是民建聯, 推舉35位候選人; 民主黨也不遜色, 有22位。其他黨派也有推舉, 但令人失望的是前線, 其中一人還加上公民起動的身份, 她就是何秀蘭。至於多出來的那個人不是劉慧卿, 我們看見前線都很厲害, 因為有何秀蘭, 有卿姐, 但她們新發展出來的參選人中, 女性不多, 沒甚麼增長。故下次她們批評民主黨立法會中沒有女性議員時, 民主黨可反駁她們也沒有增長。其實各政黨也有各自的問題, 於這裡就不多說。

至於她們的職業和參選原因, 基於這些數據都是她們自己填報, 所以我不曉得選舉事務處有否核實。這裡分析得出, 全職(即已成為區議員或立法會議員者)或者不是全職議員, 總之她報自己的職業是區議員者, 人數很多, 有41人; 填報社區幹事、社區工作者和地區統籌等地區工作者, 人數也不少, 有29人; 報稱自己是議員助理, 在議員辦事處打工、社團地區和政黨工作者也有10人。若單單是加起這三項, 人數已經不少。而專業人士則不算很多。最特別值得注意的一項是家庭主婦, 報稱是家庭主婦者只有2人, 數字令人匪夷所思。第一, 可能是選舉策略原因, 我說自己是家庭主婦, 別人會否覺得我是低能的, 是師奶而不懂政治; 第二, 這也跟性別角色定型有

關，覺得拿出家庭主婦這牌號跟專業人士的牌號鬥就一定會輸；還有報稱是議員助理或社區幹事者，其實她們會否也是家庭主婦，只不過認為用其他職業出來參選會較有優勢。這些問題也值得大家去思考。

時間已夠，那怎麼辦呢！民主黨就不說了，留給陳樹英吧！這裡已寫了出來，各位自己看吧！這裡偷了些他們的內部文件出來，其實都不是很機密，已經發生了。大致上他們的女性區議員比例少於兩成，大概八成多一點是男性。當然他們也有少許的增長，如果以2003跟1999作比較，參選人數少了，但獲勝的人數卻增多。

我們看到一個現象，無論政府高層、兩級議會或政黨領導層，基本上暫時都以男性居多。行政會議19個成員中，只有兩個女人。原本還有一個保安局局長，但已離任，現在只剩下兩個，她們就是梁愛詩和廖秀冬，所以使女性比例大跌。

至於60個立法會議員中，現在只有11位是女性，約佔18.3%，少於兩成。數字是否很低？那得看你要跟甚麼比，如果跟美國、加拿大、澳洲和其他地方比，也不算低，因為其他國家也差不多。如果跟北歐比較，當然低，因為比她們少一倍。香港議會政治現在還處於under representation，女性是比較少。剛才說的比例問題，其實現在上網可以找到全世界各國國會女性議員比例的數字，美國平均也是15.5%，我們有18.3%，其實還比美國好；歐盟也是十多個百分點，亞洲為14.5%。有些地方好些，有些差些，香港這裡的是舊數字，因為增加了余若薇，所以數值應上升了。

現在的問題是，女性是否需要出來參選。因為女性議員的比例被男性拋離，有人認為女性應該出來參選，並提出了不同的理據。其中一個理據是公正、平等機會論據（Justice / equal opportunity argument），覺得女人也是公民，也需要交稅，為何男人出來參選，而女性不參選，那麼其公民權利就遭到剝奪，故應該鼓勵女性出來參選。

第二個理據陳樹英議員會感興趣些，就是民主論據（Democracy argument）。如果我們說香港人很渴求民主，其實我們也要想清楚民主到底是甚麼，是否就等於直接選舉呢？如果直接選舉又給男性佔去所有議席，那民主又跟女人的權益何干。真正的民主有人認為應該包括不同聲音和不同代表，增加多元性的代表，男性的聲音和女性的聲音都應該得到充份表達，於議會中有代表並能反映出來。

第三個理據是女性經驗、利益代表論據（Representation of women's values, perspectives, experiences and interests）。這論據認為女性參政可令她們的經驗、角度和價值觀能夠在公共政策和議會的辯論中受到重視，使女性的權益得到維護。同時因為有女性參與影響男性和女性的政策，公共政策的認受性也可以被提高。

另一個是從實利和效益去考慮的效益論據（Utility arguments）。這論據認為我們應該善用政治人才，當中有男也有女，故女性也可參與。其他國家的研究告訴我們，很多時候找女性參選是具有一定優勢，尤其當政黨遇到跟性或貪污醜聞時，票數大跌，往往就會推些女人出去參選，此舉能取回一些選票回來，故有實際效益。

從革新政治角度來看，這說法背後有一種觀點和信念，即女性革新政治論據（Women transforming politics）。這論據認為政治經常用權力鬥爭、激烈的對抗行動、戰爭和暴力等形式處理問題，而女性較慈悲、帶母性、和平、溫和，喜歡談判、尋求共識多於對立，所以如果多些女性進入議會，就可以改革議會文化和政治文化。這觀點聽下去頗有吸引力，但本身也存在一定漏洞，這個待會再談。

還有一種叫象徵意義與角色示範論據（Symbolic meaning and role-model argument）。這論據認為如果多些女性出來參選象徵女性的社會地位提高，同時也對年輕女性有一個角色示範作用，即女性除了會打扮外，還會關心國家大事、世界大事和香港社會問題。

如何鼓勵女性參選呢？其實有很多措施可以做，譬如可以增加社區的支援服務。如果女人參與社區事務，卻又要照顧小孩，那麼我們就多給支援和支持；又或者加快民主進程，開放多些議席出來普選，使政治的進升渠道打通一些，使更多人可以參與，希望女性利用到這個機會。另外，可以凝聚女選民的力量，發揮她們的選票力量。當然，最重要的是錢，尤其參選立法會是需要很多錢，能夠成功籌募經費才可以做。

其他國家又做了甚麼呢？中國政府就因為毛澤東說過：「婦女是半邊天」，所以多年來致力增加女性在國家管理和幹部的比例。因時間關係，不多說了，各位自己看看資料吧。

亞洲也有例子是在制度上做些調適，例如引用女性保障名額。針對女性在議會內比例過低的問題，台灣、印度和尼泊爾等國家也用這個方法，設定一個配額給女性，規定不能少於這個配額。台灣以前其中一條憲法訂明女性的配額是10%，但隨著台灣現在的發展，這個數額已經過時，不用保障名額已超過10%了，所以有人建議名額需要增加。民進黨在這方面捕捉到選民的意願和期望，96-97年通過「四分之一的參政保障名額」及「女性黨職四分之一保障名額」，訂明四分之一的黨席和政黨裡的職位為女性保障名額。這做法帶動了一種新風氣，令民進黨在短時間內吸納了很多婦女選票。我不知道是否因此令他們走上獨立之路，但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這方面是做了些措施的。你看到民進黨找曾參加過婦運的呂秀蓮當副總統候選人，就可以肯定是能幫助拿到好些選票的。

歐洲方面也有些國家討論這方面的問題。例如法國有位總理提出是否要修改憲法，為女性議員數目訂一個下限，訂明不能少於一定比例是女性議員。盧森堡有人提過，如果政黨表現失色，那些政黨讓多些女性出來參選而又當選的話，將多給予特惠津貼，資助選舉。這些誘因政府可以考慮，以鼓勵他們做點事情。

還有些問題是值得思考的。第一是關於女性主義與政治代表問題，我們投票的時候，是否凡是女人就一定投她，而男人就不投他呢？曾有人提過這樣的口號：女人選女人。但問題是我們究竟是要選一個有女性意識，對性別問題敏銳和醒覺的候選人，還是只選一個生理上是男人或是女人的候選人。如認為是後者的話，是否就是所有生理上是女人的女人，都有一個性別醒覺，懂得爭取婦女權益、爭取平等權利和挑戰父權體系？這當然不是，否則我們也不用搞女權運動。所以這裡有一個矛盾我們要處理，是否男性就一定反女性主義和反女性權益。

第二個問題本質主義與政治革新。其實跟第一個問題有關，所謂女性革新政治本身也有些漏洞：認為男人搞政治如此，不如女性自己來吧！當存有這樣的想法時，其實是在鼓吹本質主義。本質主義假定了一套東西是叫做「女人」的，譬如像母親般溫柔等，將女性定型於傳統的女性特質中，假設女人全部都應該如此的。這樣也會引發很多問題，例如是否普遍存在共通的女性特質，以及是否不會受種族、階級和性傾向等問題影響。

另外是關於議員的監察與交代問題。如果說不一定是女人，男人都會爭取女性權益，那麼我們監察的是所有60位立法會議員、政府的官員或行政會議成員對兩性平等和婦女權益的表現。這個其實民間可以做的，婦女事務委員會都可以做。

性別觀點主流化是婦女事務委員會提出的重頭戲，是三大綱領中其中一個，需要在許多政策研究領域中有性別的觀點和分析。政府需要這些人才，民間也需要，好讓性別的觀點能在政策的制訂過程、評估和執行時，都受到照顧。

還有一項是透過現有建制渠道參與的機會和限制。經過多年的努力，政府已經成立了一些渠道，例如平等機會委員會和婦女事務委員會。但是能否透過他們來影響政府的決策呢？這裡是有些機制可以考慮運用的，但仍然有很多問題，包括性別歧視條例本身也未完善。另

外平機會和婦女事務委員會的成員，我們也沒辦法可影響政府的委任，當中可否增加透明度，增加民主代表性呢？如果被選進去的人都沒有性別意識，那如何辦事呢？可能都是廢物。我不是在評擊，但的確有人是這樣批評的。

關於對政黨的挑戰這點，很可惜今天民建聯的陳婉嫻沒來。剛才所說政黨角色很重色，包括提拔人才出來參選，並可以在發掘、栽培和支援女性參政人材、黨內的提名程序上作出革新，確保女性參與的比例得到提升。

對香港婦運的挑戰，現在沒時間說了，其實我們現在正站於十字路口，就是以前的香港，到現在的婦女運動在建制外的參與力量均是以社會運動的形式進行，而非透過選舉進入議會內影響政策。現在是搞婦女運動的團體要思考的時候。

最後是政制發展檢討與女性參政。**07-08**如果真的沒有雙普選的話，那如何選特首？將來的立法機關如何？公民團體議席會否增加？現在已有人說，如果要增加就增加一項「家庭主婦」的功能界別。但加進去的話究竟是好還是壞呢？我們有否一個家庭主婦共通的特性？這還存在好些問題。至於比例代表制是否有利或不利女性參與、這麼大的選區是否要多用**100**萬才能選到立法會、還有選特首的選舉委員會是如何產生、可否多增加女性代表和任何界別都會影響性別比例等。因為時間關係，我也到此為止，待會可再作討論。

陳樹英議員

民主黨屯門區議員



我猜主辦單位邀請我是希望我從政黨的角度去討論婦女的參政問題，但這也是我經常煩惱的地方，因為絕大部人看見我是以民主黨的角色來演說時都會問，為何你們民主黨到現時為止連一個女性的立法會議員也沒有。這是個相當難答的問題，但我不會避而不談。其實剛才陸恭蕙也提過她參政的過程，首先也是參加一些論政團體，但真正晉身政壇也是透過委任制度。其實我們看到在港英時代是委任了不少社會精英進入議會，就算到今時今日我們看到這些立法會議員，她(他)們或是透過功能組別去參選的，但她(他)們的知名度其實早於委任時代已經建立，譬如周梁淑怡和劉健儀等。

由八十年代開始，政府推行地方行政，開始有地區的區議會選舉。82年的區議會選舉是一個小規模的選舉，至85年才有一個全香港、廣泛性的區議會選舉。當中也有一批婦女開始透過這種模式去參政，她們透過從事基層工作而去參選，最先的一有王桂雲、蔣月蘭、歐玉霞，她們還在政壇上。當然還有些是進入過議會，現在退出了。

香港的政黨發展是頗遲的事。我記得在整個回歸過程當中，我們一直探討香港未來的政治路向，初期大家都不覺得需要一個政黨，但差不多到了六四(八九民運)之後，才忽然有一股很強的凝聚力；另外，我們也看見91年開始有立法會直選，雖然不是有很多議席，只有十八個，但直到那時才認為需要成立一個具政黨規模的組織。當時有太平山學會、匯點和民協，大家開始討論三會合併。後來許多三會成員走在一起成立了港同盟，但那三個會本身還有些運作。至94年港同盟跟匯點合併才出現民主黨。這時期也有其他政黨的催生。民協還一直維持著，出現了民建聯、自由黨。故此香港政黨至只有約十年歷史。

政黨的作用固然是培訓參政人才，透過黨內培訓、晉升的模式去培訓政治精英。社會上看見的是民主黨有多少區議員、立法會議員，但在民主黨自己本位看，就促進女性參與而言，尚未到參政為先，還有其他考慮因素。這些因素包括在五個地區支部內的參與，這也是一個爭取表現的機會和渠道。我們也有中央委員會，女性也可參與和負

責中央委員會一些事工來爭取表現。民主黨在五個支部，四十六個常委之中，有八個是女性。就中央委員會來看，三十個成員中四個是女性。其他部委可能有女性參與，有青年委員會、婦女委員會、會事委，但因有些部委重疊，故在此不論。民主黨今屆的區議員有 93 人，其中 18 位是女性；立法會議員有 11 位，但無女性。綜合來說，民主黨的女性區議員的比例不算少，達百分之十九點幾，差不多有兩成。這方面對我們來說是有少許欣慰，因為在 99 年，民主黨的女性區議員只有 12 位，今屆增加了 7 位，後來有一位退了會，故現在只有 18 位。這可算是有個大增長，比男性的還要大。

但是，民主黨仍然面對一個頗嚴厲的批評，就是到目前為止仍未有一個女性立法會議員。這裡我先跳出自己以女性角度來看。其實這有若干的理由去解釋，首先譬如政治制度改變影響了晉升渠道，這個因素不單影響女性，甚至民主黨的男性都面對這個問題。95 年採用單議席單票制，當時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席是較多，但至 98 年完了臨時立法會之後，忽然轉行比例代表制，議席是沒有減少，同樣是 20 席，但因為轉了比例代表制，使民主黨很難贏回原來持有的議席，所以當時內部的爭持相當激烈。原本在 97 年下了車的議員要重返立法會，所以當時的口號是「重返立法會」，但其實也不能完全地重返。當時民主黨本身也沒有女議員，再加上那時的情況著實沒有空間留給女性會員。

其後到 1999 年取消了兩個市政局，也對民主黨構成重大打擊。當時我們有三個市政局或區域市政局議員，本來兩個市政局被視為培訓政治人才的中層架構，但當取消了這中層架構後，我們就失去了這個渠道。後來形成不單是女性的參與，以整體而言，選舉形成了兩極化：一就是很小的區議會選舉，說的是萬七人的人口；又或者是一個很大的選區，人口至少一百萬。這兩個階梯其實相差很遠，當進入了第一個門檻而要去第二個門檻時，中間所需要的練歷很不同。同時也因為這個格局，影響了政黨的吸引力。因為如果只想當一個基層的參政人，又未必需要一個政黨背景；如果想透過政黨去到立法會層面，又會發現前面排隊的人很多，要輪到自己則需要很長時間。所以如果

一開始覺得自己有能力參政的話，也未必會選擇參與政黨，譬如用民主黨和四十五條關注組作比較可以知道，如果能夠建立一定的知名度，在這麼大的選區裡，你始終拉到一定票數，而未必需要政黨的支持。因為在這麼大規模的選舉裏，以社會的知名度為主要的拉票策略，主要是依靠媒介的，所以未必需要依賴我們所說的「樁腳」制度。我說未必，但不代表一定不需要，還得視乎各人的選舉模式。

在政制倒退和爭取議席的策略等情況下，就民主黨而言，過去以女性優先的概念是存在的，但我看是沒怎樣被採用。正如剛才黃碧雲所說，你怎樣以女性優先，譬如說是quota system，一定比例的人要是女性，這個quota system我們嘗試在幾年前的那個中委會開始試行：中委會中三十個人，四個是女性，那個比例和我們男性會員和女性會員的比例差不多，但當然都達不到一半。實際上，要找四個女性當中委還不是一件易事。

就區議員而論，民主黨也盡力想多找女性出來選區議員，以增加議席。但在政黨模式運作下，政黨自己有一個木人行，雖不成型，但卻存在著這制度。不論男女，想要透過政黨出線，中間需要有一定的練歷，譬如政治上的表現。今年引入了民意調查機制，加上黨裡的支持度，還有過去在會中有多少承擔，並在承擔的事項中的表現等，都在這木人行的制度下。大部份人不覺得有甚麼歧視，但就女性而言，便覺得想要爭取的話，就出現相當的困難。因為女性的對手都是在97年以前已為立法會議員的人，他們都是男性，固然有很大的優勢，特別在社會知名度上。我們現在要慢慢爭取和他們同等的知名度和表現，可是他們在立法會而我們不在立法會之中，幾乎是在不公平的基礎下進行競爭，要跟他們差不多，甚至要超前，似乎很不容易。

因為在現制度下議席實在是太少了，要培養新人的空間也相對狹小。不過今年民主黨也希望多點新面孔能出線，故此在我們角度而言，促進婦女參政是很基本的問題，關乎政制改革的問題。今年就是三十個立法會議席，普遍來說，市民都期望快點實行全面普選，有六十個立法會議席的話，那麼新面孔的出現才能有較大的期望，否則永

遠都是僧多粥少的問題。

此外我們還希望在黨內的事務上促進女性參與，並加強對女性的培訓。其實我們最近也跟部份團體舉行了一些工作坊，以研究如何促進女性參政，當中給予了我們一些啟發。一些政黨如美國的民主黨和公和黨，他們如何提拔婦女領袖，我覺得我們必須要在那方面多看一點。而對於婦女參政和 empowerment 方面，是要用上很大的力度，因為真的不是很多女性覺得她可以從一個區議員的層面跳升到立法會的層面，正如剛才所提到兩個架構中的距離很遠，所以撤消市政局肯定是對培訓參政人才一個很大的障礙。我們也想多邀請女性入會，廣泛吸納女會員；並在我們現有的女性幹事，正如剛才黃碧雲所說，新的參選人許多都是議員助理，故我們希望多找到這樣的人去參政。

當然最後我覺得一個政黨，無論婦女參政的人數或多或少，都很難取代婦女團體的角色。政黨會看婦女的票源，因此無論有沒有女性議員都會關注婦女議題，民主黨的婦女委員會或多或少都扮演這角色，它們經常把婦女關注的議題告訴我們立法會的議員知道，和他們一起在這些議題上爭取表現，為婦女爭取權益。但從整個政策的角度來看，未必很能夠全面實踐女性主義。所以政黨和婦女團體是有一個互動關係，透過婦女團體的看法，給予政黨一個訊息，以致能不斷調整政策上的立場和爭取的目標。

我希望在這裡透過互動和合作促進政黨婦女的參與，多謝各位。

金佩瑋議員

公民起動灣仔區議員

2004年兩性角色工作坊 婦女與政治參與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



因為我比較矮，所以我不習慣站在講台後只剩下一個頭（故此坐在嘉賓席上發言）。我可以透露一些情況，11·23選舉當天，我的對手（一位民建聯候選人），他曾跟我說，「金小姐，加入我們民建聯吧！」我跟他說，「隨便吧，一會兒再談！」到第二次他以同樣問題問我，一日之內被問了兩次，我就很怕，於是回答說，在民生的事情上合作是沒問題，但入黨就免了。正如陳樹英所講的，我們這些small potato（小角色）剛出來，甫踏腳就走上了政治舞台，但他們（大的政黨）還要過木人行。那樣子（入黨的話）有黃帝不做去做妹仔，當然是不會啦！

返回正題，抱歉我是昨晚半夜才完成我的講稿，所以不能派給大家，但其實我也是分享自己的經驗。嚴格來說，去年我參加區議會的選舉，其實沒有高舉性別或婦女參與這一個旗幟。當時也有想過，只是除了鄰區的一位男性候選人之外，全部都是女人，甚至全都跟婦女運動有關係，最後各人個別都不同程度地舉出性別旗幟，我本人就不大高舉這性別旗幟。但對我來說，性別這因素是我一個逃避不了的焦點，從選舉到參與議會工作，我都很深刻的體現到婦女參政是有兩個方向，一方面就如剛才黃碧雲所說女身走入政治食人花森林之中，第二種是帶著剛才談到的婦女意識，或是性別醒覺，玩一場相當之雄性化的競賽和遊戲，當開會時就會明白甚麼是競賽和遊戲。用「雄性化」，因我不想用「男性化」這字眼，因為不止男性才玩這麼一個雄性化遊戲。

或者我只能代表我自己，今天到來亦不能算是代表公民起動，所以我也只能分享自己的經驗。正如有一句諺言所講：「我們能從一粒細沙裡看出大千」，或者我的故事能反映出女性參與政治的一些現象。

首先講講女身，我想今天香港裡，一個生理上是女性的人走入政治市場裏，其實大家都沒有甚麼感覺，但市民潛意識中都對這些女身存在各種想法和期待。在選舉過後不久，我寫了一篇題為〈頭髮越短，年紀越大，女性參政越有機？〉的文章。我用不科學化的方法分

析出有7成女性候選人，她們的頭髮都是不過肩。七成人中又有超過八成人頭髮短的較中性look，除了周潔冰之外，沒有人是很嬌俏艷麗的。至於當選的女性中，有六成半人都是短頭髮（以不過肩為限），而形象都是中性、硬朗和能幹；還有些年紀較長，外形像「阿媽」的，她們的勝出率亦相對高；廿來歲的只佔百分之四十幾能出線，但像「阿媽」的就有百分之六十以上能出線。所以，簡單而言，市民心目中期待的「女性民意代表」要夠能幹、硬朗，有雄性氣質，但同時又要具備「阿媽」或女性特質，如黃碧雲所提到的溫柔…甚麼等。即是既要能幹，同時樣子又要讓人覺得能「照顧」該社區。

在候選時，有街坊曾不下一次的跟我說，那也不是用很嫌惡的嗓音對我說，「金金，真的看不出來喎！樣子這麼硬，實質是這麼溫柔，你這樣子唔得嫁！說話陰聲細氣，將來街坊怎麼期望你出來為他們爭取權益呢！」我聽後就在滴汗。另有說：「你用得到的時候，溫柔又好好用。」還有的說「女人去洗樓，是有著數的。」所以在我隔壁的一位男議員，他也特地請一個女性議員助理幫他洗樓，他很喜歡洗樓，我自己則不大喜歡。

是幸或是不幸，我的對手就是一個樣子甜美、長髮，雖不是少女，卅多歲，但樣子很年輕的女子。相對來說，我的樣子就可以騙人，可能因此我勝出的機會就大了。但話雖如此，其實我現在頭髮已經長長了。當年我短頭髮而又中性的外表，你們現在去灣仔辦事處還能見得到，照片中的我修skin head，頭髮只長1厘米。聞說當時不少街坊，甚或是我的對手，均批評我不男不女（卻不會說似男又似女），用的是負面形容詞，一口咬定說我這副長相一定選不到。左派報紙甚至說我是女同志，一定會失掉阿婆們的選票。總之他們會用這類性別和性傾向的字眼作為攻擊我的武器，直到今期壹周刊仍然用這題目來訪問我。最要命的一件事是，原來有許多人仍不知道我原來不是男人，聽聞有一個選了我的男人大聲的跟人說：「我當然選二號啦！我是不會選女人的！」無論如何，現今的人都很會取巧，選舉過後，人們就走來對我說，總之你做到事就可以了，勝者為皇，不需要

再說那麼多。

話題返回議會，其實大部份的工作都和性別表面上沒甚麼關係，但又不代表沒有「性別」這隻螢火蟲在中間穿梭來往。例如，我猜黃碧兒會了解的，政府開會各人會有一個名牌放在會議桌上，男人就沒甚麼，只一個名字，女人就一定在前面加上小姐（Miss）、女士（Ms）和太太（Mrs.）等字眼，而無論誰坐上主席位他就一定是 **chairman**。只是個英文字，本來就沒甚麼關係，不過有時看上去還是很礙眼。我開會有時都要求同事用 **chairperson**，甚至不介意用 **chair** 一字。後來，總之是我開的會，同事都不放 **chairman** 這名牌。但其實我爭取得很溫柔，沒有硬要這樣那樣，那都是我的男同事才會做的。

提到男同事，其實有些都頗難相處。有些「土豪」會欺負女人，以為你新來的，居然來侵佔他的地盤；或是另一種極端，總是 **Lady first**，擺位給我坐。很不自然的，尤其是到今時今日這個年紀，還要給你拉椅和開門，我會覺得很尷尬；然後行又要給我行先，我不明白為何是要我先走，不喜歡走在前頭。特別是在正規場所更突顯這些礙眼的事情。當然這還算是小事，大事上其實都存有性別角度。我們灣仔要做許多市區重建和城市規劃，這些事情其實需要有個婦女角度。舉例如安全，在大廈和道路設計上如何能對女性或是弱勢人士才算是安全；另外如屋宇設計上，如何能使廚房不會太熱；亦有婦女反映，為何整座大廈都沒有室外晾衣設計，是否都要住戶購置乾衣機。這些都不為屋宇設計者所考慮，一幅很好的外牆，但只讓它給太陽直照著，而不給設計晾衣架。社區上的治安和文化活動等均有這性別角度，治安問題如一樓一鳳等，性騷擾暫時還較少聽到；文化活動方面，像如修頓球場 98% 的使用者都是男人。噢！原來已沒時間了，那我不再說了，只照稿念完罷了！

即使只是女身參與政治，都不等於女性政治參與者具有性別意識。黃碧雲或會提問甚麼是「性別意識」，那我準確點說是「陰性的政治氣質」。時間關係不作深入探討，其實我們心目中怎樣也會鎖定

了些特質，譬如把人看成是人，喜歡和人去談論、協商，不對立，少些權威，多點聆聽，容許多些感受性的空間和交流，還有的是較實事求是，但不曉得這會否只是我個人問題，好實在的做事，而非扮孔雀，撈政治本錢，甚或扮救世主，甚至尊重不同意見，這些我都稱為「陰性政治氣質」。

話說回頭，這些我們認為是好的事情，當走入議會中不一定是好的。已經有不知多少個同事跟我說，你太溫和了，你要硬些，要Firm些、Assertive些。這可能是我的缺點，但我又會想，做事情是否只有一種方式。其實我只做了半年，時間不算久，我有拿這些「陰性政治氣質」去做實驗，我自己覺得較為成功的例子是有的，特別是在處理一樓一鳳這個問題上。若投訴人的態度太惡劣的話，當然我也處理不了，但若求助人態度良好一些，我會起到橋樑角色進行商討。而求助者不一定要找警察使彼此關係變差，例如我可以找紫藤協助，如嫖客把地方弄髒，我安排他們找人清理。即是會做兩方面的工作，使情況和諧地得到解決。因為已經沒有時間，故不能舉出例子。

至於不成功的例子，其實我覺得和我的處理手法無大關係。如果對方的態度太惡劣，表現得太驚怕，那就根本連討論的空間也沒有。如果不是太怕，我當然會用溫和的方法，那彼此還可以討論，像如跳探戈的一起找出解決方法。但我要進一步學習讓自己變成水，水是怎樣的呢？水放在杯中是一杯水，沖進茶壺中是一壺茶，到了廁所，那又有另一個形態。水是可以流動可以應變，有時候需要將自己變成一壺煮沸的水，是有力氣，具威脅性。有時又要變成冰，冰冷而硬朗。問題是需要知道那個時候變成那個形態，某程度上我猜這些也是「陰性政治學」裡需要學習的功課。簡單而言，陰性政治氣質不等於柔軟，溫柔不是軟弱，而是能夠捍衛市民的利益。我覺得這個陰性政治學、政治觀點是可行的。

最後，我想分享些我在社區裡工作的觀察。，真正女性的社區政治參與，可能在座的各位你們的經驗還要豐富。很慚愧我是去年十月中才正式落區，我發現除了些靠取巧的人之外，那些走出來很積極參

與活動、爭取合理培賞、反對胡應湘興建酒店的人，有一半都是女人，當中有些是太太，無論是否有錢，有些是半職業，即做兼職的女性，只擁有少許知識，她們參與的其實都屬於是很硬的政治。範疇雖是城市重建和規劃，但參與原因又類似於保家衛國、保衛家園的，而更多時候是男人，或職業女性都忙於上班工作，相比之下，這群參與者顯得較有時間可參與其中，於是成為主要的跑腿。她們參與了保「家」的抗爭，人們常說家跟公共空間、家跟外面是對立的，但這些女人就為了保護她們的家走了出來，向著公共空間這個普遍認為是硬政治去爭取。又因這爭取，她們開始對公共空間產生了興趣，以前一打開報紙先看娛樂版，現在可能是先看頭條新聞。有時候，她們對公共事務的興趣比男性還要大，例如一位太太就成為了保護維港和爭取民主的積極參與者。這些參與者給我的觀察是，她們較我半年前認識時更為成熟，無論處理事件或待人接物。而我站在這個陰性政治學上，比較強調跟她們的partnership，而非說我來打救你們，某程度亦鼓勵了她們為自己和他人的權利而挺身。

我記得有位老男區議員，曾提過區議會甚麼也做不了，又無民主，甚麼都沒有，陳樹英當時便立刻反駁他。但這半年的經驗告訴我，其實地區是有許多人陪你玩，讓你玩，故此地區工作才是培育基層民主的最佳場地。剛才不記得誰說，我們要學做公民，其實由社區做起最好。因為推動民主最重要的是改變人的想法和素質，這些donkey work驢仔工作(苦差)，坦白地說，我覺得女人做的最好。所以，我的結論是，區議會是應該交給女人的。多謝！

黃碧兒女士, JP

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婦女事務)



首先我很感激中大的性別研究中心邀請我出席，並分享一下政府在諮詢和法定組織的婦女參與問題上扮演著甚麼角色！

基本上，婦女參與立法會、區議會的比例偏低，尤其是香港一半人口是女性，又現在許多女士無論學識、經驗、專業才能、社會貢獻都不應只止於現在的百分比。政府的諮詢和法定組織現在百分之二十二女性，雖然自婦女事務委員會成立並大力倡導增加婦女參政這一議題成立之後人數已有所增加，但比率依然偏低。在各級議會中女性參與率都不算高，雖然香港並不低於很多先進國家，但我們覺得還有很大空間可以改進。

或者我介紹一下婦女事務委員會成立後的立場如何。婦女事務委員會在三年前成立後，訂立了三個重要工作範疇，第一是增強婦女能力；第二是推動性別觀念主流化；第三是公眾教育。在增強婦女能力方面，推動婦女參與社會事務和決策過程是重要的一環，婦女事務委員會一直倡導讓更多婦女參與政府的諮詢和法定組織工作，以確保政府在各決策過程中兩性的意見得到充份反映和考慮。我身處的衛生福利及食物局一直有協助婦女事務委員會多次跟民政事務局開會，建議如何提高諮詢、法定組織中婦女成員的比例。

至於政府的回應又如何呢？以往政府在委任成員到諮詢和法定機構的時候，考慮的因素是最合適的人選，而沒有考慮人選的性別這因素，更沒有注意到這些組織中男女成員的比例。在婦女事務委員會的大力倡導下，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的政策委員會便定下一個重要原則，就是在委任諮詢和法定組織成員的時候，必須考慮有關組織現時男女成員的比例，及將要委任的成員對這比例的影響。政府也接受的觀點就是這些諮詢和法定組織中，如果可以保持一個均衡的男女成員比例，便會有助於確保兩性的觀點和所關注事宜，可以獲得充分的反映，因為若這些諮詢架構能全面吸納兩性意見的話，則能集思廣益和制定更完善的政策。政府初步制定了婦女在參與這些組織中的比例是不低於百分之二十五這個工作目標，並且要求各決策局和部門要積極廣泛物色和栽培這些積極又樂意貢獻社會的婦女參與這些組織的工

作。

我在此想指出，百分之二十五只是初步的工作目標，長遠而言，我們希望可以逐步提升這基準，來符合國際標準。與此同時，政府亦採取積極的措施以促使更多婦女參與諮詢架構工作，民政事務局和婦女事務委員會都分別致函給大約三百個非政府機構、商會、專業團體和婦女組織，邀請他們並鼓勵有意參與公職的女會員，將他們個人的履歷表交到政府的中央名冊資料庫，讓政府可委任更多女性人選擔任公職。在政府的努力推動下，這個諮詢和法定組織的女性參與率由2002年6月（即政務司司長主持政策小組決定需要考慮男女比例）起，當時作出的比例是百分之十六，時隔一年多，至今年年頭，比例升至百分之二十二。與此同時，政府中央個人檔案資料庫當中有女性資料的比例由之前的百分之十九點幾，增加到現在的百分之二十一。雖是增加了少許，但可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身為促進婦女政策和福祉的衛生福利及食物局，我們更以身作則豎立榜樣，局長楊永強醫生已親自下令要求局裡同事和所屬部門在委任成員到諮詢和法定組織時，要盡量提高女性成員的比例。我們的工作目標，不是整個政府部門的百分之二十五，我們內部的目標是達至百分之四十，現時我們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屬下的諮詢和法定組織女性成員比例已達到百分之三十八，而目標是百分之四十，較其他政策局名列前茅，但我們會繼續努力不懈，力求要做得更好，豎立一個最好的榜樣給其他的局看。

至於民政事務局亦作出許多努力，他們現在應其他政策局要求提供人選的時候，努力確保男性和女性的比例最低為百分之四十，高過現時政府的百分之二十五的工作目標。我們可看到行政長官在今年的施政裡亦重申要支持婦女參與諮詢和法定組織的工作，他說「我們在設計和推行政策的時候，會考慮兩性的觀點，並且致力提高女性參與政府諮詢及法定組織的工作。」我們會繼續努力，締造有利的環境，務求使香港婦女有更多機會盡展所長，展望將來我們會採取更積極的行動鼓勵更多的女士擔任公職。現在我們正考慮舉辦一些活動給予有

志參與公職的女士，並且將邀請政府部門的代表來解釋有關諮詢和法定組織的工作，和邀請現正有公職的婦女出席有關活動，分享她們的經驗和心得。目的一方面是幫助政府官員認識更多有興趣擔任公職的女性人選，另一方面是讓有志擔任公職的女性進一步知道諮詢和法定組織的工作。除此之外，我們會採取重點處理手法，就著個別女性參與率偏低的行業或組織，和有關的政策局和部門討論並跟進，希望提高有關組織的女性參與率。

我亦希望藉此呼籲各女士和你們的女性家人、朋友，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包括政府的諮詢和法定組織、專業團體、社區團體、婦女團體、宗教團體或其他團體，一方面可以貢獻社會，另方面亦可在參與的過程中得到滿足感和自我增值。我今日也帶了一疊個人履歷表，如各位有興趣參與政府的諮詢架構工作的話，煩請填妥此表，交回民政事務局，如不足夠的話，還可自行複印和在互聯網上下載。此外，我亦希望各團體尤其政黨積極培訓和提名更多女性候選人參與今年的立法會選舉，尤其是一些還沒有女性立法會議員的政黨，希望他們能加倍努力。我相信在政府、各團體和婦女本身三方面的努力和互相配合下，將來婦女參與社會事務和諮詢架構和各級議會的程度將有實質提升，可以確保女性的觀點和需要得到充份的反映和考慮，讓婦女的潛能可以進一步的發揮和為社會的發展注入新的動力。多謝各位！

討 論

台下聽眾提問



第一題：

剛才聽過不同的講者談論婦女參政，給我兩種感覺，第一是在玩數字遊戲，計算婦女在不同政治層面的參與。譬如諮詢架構的25%是怎樣來？不曉得婦女事務委員會推薦這個數字的時候，他們做了些甚麼的檢討，為甚麼是25%而不是更高，即是現在已達到22%，要填充至25%我想其實不是很困難的。這裡還牽涉到剛才黃碧雲所提的，是女人身份進入了這些架構，還是我們在說一些意識層面的事情。因為我覺得「婦女議題」和「婦女意識」很不一樣，後者是一個分析上的處理、處事方法。所以我覺得剛才所講的，即便是政黨都在玩數字遊戲，有多少的百分比、多少位婦女在甚麼議會之中、多少位婦女在參政。我們要思考的是為何有些婦女團體在某些事情上卻步，因為我們不是在玩數字遊戲，而說的是婦女議政、婦女參政是以甚麼素質來工作。坦白說，婦女之中也並非單一化，而是有許多不同的分別。這裡講的政治遊戲，包括了許多基層婦女參與的工作，譬如參與政府的諮詢架構，但裡面的文件，光是看也沒時間，何況有許多可能只有英文。所以整個遊戲是否利於婦女參與，和讓不同階層的婦女參與，我覺得這些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第二題：

我想問黃碧雲博士，我有一個疑問，就是入政界需要有能力嘛！你今天講的都是些比例數字，諸如十個佔兩個，九個對一個等，但如無能力的話，又怎能坐到這個位置。我的問題是，如果去投票，到底要把票投給誰？如果這人無能力的話，我是不會選的。你今日提到政治裡面少了些女性，我覺得假如該候選人有能力才幹，無論是男是女我都會選他。但現在你則強調男女比例，這又令我感到很困擾。另外，金佩璋議員講到的陰性政治像是太極般，可卸則卸。其實我平時都很溫柔，雖然有時都可以很兇，尤其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的時候，所以我覺得陰性政治是需要很大的耐性才能學會的。

第三題：

各位講者，我的問題是關於兩個Concepts，就政治參與而言，

大家如何看待Quota system，以及它變作Positive discrimination的話會如何。

第四題：

金金(金佩璋)所講的陰性政治，女性好像水一般又可以爆炸，又可以變成冰，其實我相信男性也可以這樣子。假如男性的角色定型不是那麼強的話，他也可以變成水般溫柔。男性扮演溫柔的角色，女性則扮演好硬朗的角色；或男性扮演硬朗的角色，而女性扮演溫柔的角色。其實各種情況都有可能，問題是社會對他/她的反應會很不同。如剛才提到，一位先生要求一位很能幹的人，雖然女性也可以做到，但社會對她的硬朗不接受。社會上的角色定型很嚴重，雖然女人也可以能幹，但社會看她的硬朗和能幹跟男性則不一樣。另外我想問黃碧兒女士，我猜現在計算出來的25%是整體而言，未有分開每一個諮詢和法定的組織，可能某個組織女性比例很高，某些又很低，甚至是零。你將全部數值拉平均雖可得出一個數字，但卻不能完全反映現實，也未必為婦女團體樂意看到的現象。現在雖然整體有22%，但有可能每個組織20%，會比整體22%更為進步。其次是黃碧雲所說的，不是一個女性的問題，而是一個女性意識的問題，如何能確保有多些具有女性議題意識的人士可以進入，可能是委任機制方面有問題，即是如果委任一個女性，但她卻對社會上女性的問題、婦女團體很少接觸的話，那麼委任一個女的和委任一個男的其實沒有分別。可能需要在委任機制上作出改善，以求擴大其代表性，才能改變政府裡決策層面的質素。

第五題：

我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因為以前參加過女青年會關於婦女的一些專題報告，我和一群來自不同大專院校的同學正在做一個「婦女力量與決策」的專題，有幾樣想問的，可能和幾個講者談到的層面有些分別，仍希望各位可作解答。我想問關於政府方面，其中婦女事務委員會關注的性別觀點主流化，其實在我們做研究的時候發現，北歐四國的官方網頁一開始已表明Gender Equality、Gender

mainstreaming，是跟社會的經濟、文化齊名，而我又找過香港的資料，可能我們是比較後進，像是很少提及這方面的事情，是否說在政策上很少考慮到兩性觀點這問題？另外我想知道婦女事務委員會有沒有能力去影響決策，或有沒辦法在決策上反應到我們的意見，而考慮兩性問題？我還想問關於公眾教育，你們有否特定的對象，如向基層女性，或透過知識份子、大專院校的學生宣揚你們的訊息？像我這麼一個香港土生土長的女士而言，如非參與這些正式的研討會，或者在大學裡，自己很有興趣修讀一些性別研究課程，是很少機會接觸到關於這方面的事情。

第六題：

我想問台上嘉賓，現在我們所講的婦女參與政治，很大程度都是文化程度較高的女性，金金（金佩璋）議員就認為師奶的形象就像媽咪一樣。婦女參與政治的比例上，我覺得基層的婦女參與比例較多，如果不單從數字上作考量的話，是否可以考慮多一點如何將婦女地位意識提升，我覺得是應該讓研究人員在這方面有多些的參予和研究，而不是研究有多少個人可以參政。正如剛才民主黨的陳樹英議員講到，他們是追求民主，那為何他們立法會的女議員比例又很少，會否和他們自己黨內的晉升機會和途徑有欠缺的地方有關？她又提到普選政制和婦女的參與，好像將兩者劃上等號般，但我又覺得是不一樣，如果全部普選的話，不等於民主黨的婦女代表就一定能夠選得上。我覺得整體社會對婦女的參政意識去到哪裡，這才是關鍵。還有我們婦女意識的教育是去到哪裡、思維的提升去到哪裡，這才是關鍵。政制和社會的制度當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覺得主流不在這方面。另外我想跟黃碧兒副秘書長講，這些表格我們都很想填，但又好像無資格，因為我們是來自基層的婦女代表，我們很想去參與，但不用去到政府的層次，可否在一些區議會的諮詢機構，有我們基層代表的聲音呢？我覺得你們是否可以研究一下，有不同類別的婦女聲音，如剛才有提問說，有好多的文件都是英文的，可能對基層的婦女構成一定的障礙。

嘉賓回應

黃碧兒女士：

有幾點我想回應的，首先是問政府怎樣訂立25%的標準，大概兩年前，我們做過政府內部的一些檢討，綜觀所有諮詢機構當時的婦女參與比例，我們發現有不少諮詢機構是完全沒有婦女參與，故對許多諮詢機構而言是由零開始，由0去到25%，不能說是很容易就能達到的目標。有些行業因為香港男女分工問題，部份行業有許多女士，部份行業則很少女士。故有部份的諮詢機構就著某些專業，譬如工程方面，真是比較少女性。我們都體諒有些地方是存在困難，所以不是婦女事務委員會自己提出25%的工作目標，而是政府內部都有參考當時的情況釐訂25%。有些是由0開始至25%，而不像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在原先的基數都不是太低的情況開始，現在較當初增加3%。但要知道委任的時間是有一定年期，如兩年至三年，即使我們發現有些機構或架構是很少女性參與，我們也不能因為性別的原因而辭退委員，相信此舉會引起很大的風波，這也不是我們想看到的。所以我們要等每次有委員任期屆滿時，當有新委員要填充或加入時，我們會鼓勵他們率先考慮女性人選，這過程是需要一段時間。譬如一個委員會每年都有兩三個空缺，我們就會針對那兩三個位置，所以不見得能一下子變作25%，下年30%，後年就40%，也不能快到這速度。

剛才也有人士提出我們不是單看數字比例，也要考慮那委員是否真的能代表女性聲音，並帶入不同角度。所以婦女事務委員會也考慮與不同團體，包括政府的和非政府組織，提供不同的培訓課程及工作坊，給予新委任入政府諮詢架構的人士。趁他們還新，對這架構的工作還不很認識，也需要一Induction或Orientation的時候，那我們把性別的角度加進去，讓他們也留意這個問題；而非委任他們進去，就好像其他男士一樣。我們的工作坊也很歡迎男士，讓他們也有性別意識，能反映女士的需要。

另外，剛才一位女生談到 Gender Mainstreaming 性別觀點主流化。這是婦女事務委員會其中一個重點工作，於兩年前，即政務司司長主持的政策會議中已敲槌定案，將在政府內部逐步推行。今年特首的施政報告也提到，要就這個性別觀點主流化製造一張清單出來，並將這清單在不同的政策範疇中落實執行。現階段已在十多個政策範疇中試行，又作出了相應修改，並繼續陸續推出。雖有人認為為何如此慢，怎麼不一次性推行。但要知道下命令不難，最難的是要讓推行性別觀點主流化者明白甚麼才是性別觀點主流化，若他們只是應酬式，說是明白了、做了，但其實不知道怎樣推行，那就沒意思了。最重要是給予他們適當培訓，我們每年都不斷舉辦這些培訓給不同部門、不同職系的同事，針對他們工作上的狀況，使他們能加入性別考慮和了解在清單中應該注意的事項，並告訴我們有可以給予甚麼支援，就是在彼此有商量的情況下推行。由於這過程要培訓和商討，是一項人力密集的工作，而人力密集也是一個阻力，而並不是他們抗拒或反對這事項。因為在深入討論中，他們均明白接受，重點是能深入溝通，但這需要人力和時間。

問：在現有機制中如何促進基層婦女的參與？並可擴大的空間。

金佩璋議員：

今日講婦女與政治，其實區議會對人的任命都很政治化，決定任命甚麼人進去做代表，我們可有的空間不大。但所有選民都是議員的老闆，我的經驗是，女性是會影響我，而我也會接受影響。很多不正規的 section 是可讓基層婦女參與的。

問：如何在政黨中把婦女意識放進公共意識層面？

陳樹英議員：

其實我剛才也說過，政黨不能取代婦女團體角色。我的觀察是，當政黨要接受婦女議題時，其實或多或少，都是由婦女團體提出來，而未必是從政黨本身引發出來。但政黨作為開放性組織，在面對社會不同訴求時都要處理，所以過去我看到的情況是，我們和婦女團體溝

通和交流後，提出了很多政策以增加女性權益，當中大部份是民生政策，例如單親家庭免稅額、把母嬰健康院改建為婦女健康中心和擴大婦女健康中心服務等。另外，亦有相當多是權益性層面，譬如說性別歧視和新界繼承權取消括免等。

另外我想回應關於婦女參政的局限，政治制度和我們本身民主黨裡面如何提升女性地位和如何鼓勵她們參政，這兩方面的比重那方面較多呢？我只能從我們組織的角度說出事況，當98年改了選舉制度，其實有相當多97年前立法會的議員是回不了立法會，如民主黨的黃震遐無法參選、新界西陳偉業因為護照問題、原來經選委會入立法會的張炳良和謝永齡已經再不能參選、還有黃偉賢等等是沒去參選、單仲偕需要轉去功能組別。可見在舊人競爭激烈的情況下，新人的空間是相當狹窄。當時曾想到，推舉女性去參選不是不可行，但必須要考慮勝算問題。如果只是為了拿一個議席的話是可以的，但要在不同地區拿取多於一個席位的話，那女性的局限會較大、機會又變得細了點。所以在婦女委員會的角度是盡量希望擴大婦女出線的機會，但整個會的角度是希望盡量爭取多點議席。從較大的勝算角度去考慮，是在一個互相爭持的情況下決定誰人出選。我只能說過去我們所爭取的是女性必須有一個晉升渠道，故在隊中要逐漸安排女性。今年能否有女性獨當一面去參加2004年立法會選舉，現在還沒有定案，因為我們會裡的甄選程序還沒完成，但我猜社會大眾都密切期待希望能看到這個局面。

問：配額制度是否有一個有利於婦女參政的制度，而以這政治評審的角度來看又有沒有矛盾呢？甚至現在功能組別有人提議加入家庭主婦，你贊不贊成呢？

黃碧雲博士：

若有家庭主婦這一界別，不知我可否報名，是否要先辭退理工大學的工作呢？剛才台下有人提到，如果我作為選民，選舉的時候當然要投票給有才能的人，而沒有理由只因為他的性別，基本上我同意這個說法。但我們反過來又要想一想，為何我們香港的議會裏女性只有

成半多一點，是否女性的能力才華只及男人的成半，所以她們在議會裡只值得拿取十多百份比的比例。當然這個說法是很不合理，我們研究香港過去三、四十年的發展，女性隨著普及教育的推行，教育水平不斷提高，並進入了不同的專業領域，包括以往由男性主導的行業，現在已有很多女性，港大亦由以往不收女生，到現在入讀大學的女生較男生多，有些科目還以女生為主，有些你沒想到的科目如法律收女生也較多，也有女性專業人士和女性企業家，但為何獨在政治領域中，女性特別少呢？

全世界不同國家都想找些特殊措施，把這個性別不平衡的情況扭轉過來，其中一個方法是配額制（Quota system）。當然這個方法也有其爭議性，有人認為若作為發展階段的考慮，作為權宜之計是有其價值，因為現在是一對九或二對八，所以希望能扭轉這情況。美國行了多年的Affirmative action（正面積極行動），就是讓背景比較弱勢的人得到幫助。除了女人是處於下風外，有色人種，如黑人、西班牙裔和貧窮的人，政府希望有些正面行動去幫助他們，所以採用了配額制。例如在大學、政府部門或社會裏等地方幫助她/他們拿獎學金；大學收生時幫助她/他們；聘用大學教職員時考慮女性、黑人等等。他們背後的哲學是，當差距大時，他們嘗試打破，從而成為最開始的動力。

但也有對配額制提出不同的質疑。有人質疑配額由誰決定，水平又是怎樣。配額水平太低沒有用，太高又不合乎實際情況。另外配額制也要面對反對力量，在社會進步的同時仍要不斷檢討機制和比率。還有一個批評是定了配額後，就正如最低工資的辯論：如果最低工資是20元，以後就爭相給20元，雖然本來可以給30元的，故女性配額都可能出現這樣子的問題。例如民主黨要零的突破，當突破了成為一時，就以為夠了，便停下來了，那時優惠配額就變成了最低配額。所以我們要持續鬥爭和改變，也要有很多的考慮。另外，女性意識也要提高，例如不要只是關心家庭事務，可以嘗試關心社區的問題。女性要有這些意識，並且也需要有培訓。

當然，政府若能在開會時使用中文文件就更好了。有些國家，政黨為了增加女性參與政治事務，會照顧她們的需要，如提供托兒服務、遊戲室等配套設施。可能立法會也需要這麼一個遊戲室，好讓婦女能開會。但當中需要有一定的變化，即是由以往男性為主的會議，當加入女性後，各方面需要有所調適。女性要調適，男性也是。市民也要轉變固有的想法，例如女性是做不了大事。其實我覺得香港的選民大部分是沒有性別歧視，例子有余若薇；另外現在最受歡迎的立法會議員，許多都是女人，所以不存在歧視認為女人都做不了事。香港社會較少這方面的問題，可能是因為很多能幹的律師和教授都是女性。所以香港在這方面其實很開放，雖然最初可能是只投選男性，但後來覺得其實女人也可辦得到，以後則可能會續繼選她，這個也是一個過程，是一個衝擊社會的過程。我希望婦女事務委員會現在都想這方面，在諮詢架構委員會中加入多些女性成員。當然剛才提到女性的問題又需回到本質主義的問題，我們不是只想有些女兒身。可能女性方面都有許多不同背景，所以可否是 Gender + Class，性別加階級、性別加種族、性別加年齡、性傾向、宗教；又可否是性別加不同政見，想法要再 Dynamic 一些，不單是為了湊夠數目。

我最大的擔憂是進入了 data base 裡的人，是誰把他抽出來，又以甚麼準則才給抽出來，是真的以性別因素，還是因為階級背景，是否要一個聽話的、乖的人參選，還是搞對抗但能幹的。我不知道準則如何，我只希望能有多些透明度，無論是平機會或婦女事務委員會，各政府和法定組織亦然，告訴人們甄別條件是甚麼，而非口講是性別而內中還有其他因素。其實我也早已填表，我也自覺非無才能，也有點兒學識，但卻未曾有找過我，我覺得我能涉獵的範疇都頗多，大學時讀宗教，副修藝術，再讀政治，也作性別研究，相信總有一項在幾百個委員會中的一個合用，但仍沒有找過我，我也不知道原因在哪！

分組討論報告



第一組：香港婦女參與政治遇到甚麼障礙？如何消除這些障礙（例如政府的角色、社會和教育等）？

我們覺得婦女的障礙很多，特別是基層婦女的障礙。因為我們小組很多都是來自基層，她們覺得今天四位講者可能都曾留學海外，具有較高的文化程度。對於基層婦女而言，是有一些不是靠理據就可以說服我們的障礙。我們希望教授們、研究人員能夠真真正正進入基層當中，聽聽我們基層婦女要求參與政治的聲音，多謝大家。

第二組：怎樣培養婦女的政治領導能力？

我們第二組其實都是承接第一組的分享，因為我們討論的都是基層婦女的問題，但我們這組則較樂觀，肯定自己身為婦女的能力。其實我們都講協調、投入和實事求是，我們覺得主婦都可以做到這些。首先我們肯定了自己擁有這些非男性所定義的政治領導能力，即一些我們所謂的陰性政治領導能力。我們先肯定了自己，再去想想可以做些甚麼，我們剛才也談過女性可能需要多些勇氣方能進入政治圈子，而且需要去見識多點，而這類工作坊和講座是個好開始，讓我們可以認識多點。討論中我們也提過政府應辦多些認識社會的講座，而非只教授防火知識，好讓婦女多認識社會層面的事情。還有一個很好的觀點就是希望政府投入資源和配套設施幫助基層婦女，因為基層婦女要擔起照顧家庭的責任，她們如何能帶著小孩去參與政治有關的活動呢？所以這方面可能需要看管幼兒服務，好使他們有較大的空間和自由度去參與。

第三、四組：婦女參與政治能如何加強政策及立法的性別觀點？現有的政治架構是否缺乏性別觸覺？

我們此組於開始時也提及女性參與政治的一些障礙。組員提及一些家庭上的困難，而架構上似乎也缺乏性別觸覺；有組員提到區議會內有許多委員會，如青少年委員會，但偏偏沒有一個婦女委員會以關注當區婦女的需要。此外，有關婦女於參與政治時卻步的原因，組員

提及是委任過程不透明，不明白遞交個人資料的過程，及資料如何被運用等，故使她們卻步。雖有這些障礙，但現在已有一點進步，如民政局鼓勵十八區特別提拔些婦女領袖，除了提拔立案法團中的婦女從家庭出發而參與政治外，另外亦找些從事地區義務工作的婦女去服務社區，因為她們可能對社區有較多和深入的認識。還有，組員覺得可從兩方面著手，如民政事務局代表政府架構主動接觸婦女，另外婦女透過所參與的組織聯絡政府，告知她們有甚麼需要。

補充一點，有些婦女是有多年義工經驗，並有興趣參與些政治活動的，但她們本身對這方面認識有限，也想知道多一點，希望政府能在她們參與諮詢會前提供培訓，而非委任、進入了組織之後才有培訓，好讓她們能先有所了解和準備，才能在參與工作時能踏實些。

